



从百年屈辱 到民族复兴

第一卷

——清代外债与洋务运动

修订版

许毅◎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顾问：金普森 孔永松 陈宝森 叶振鹏

主编：许毅

副主编：王晓光 申学锋 张侃

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

(第一卷)

——清代外债与洋务运动（修订版）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责任编辑：卢元孝 余建春

责任校对：徐领柱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潘泽新

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第一卷）

——清代外债与洋务运动

（修订版）

许毅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装

760×990 16 开 21.25 印张 320000 字

2006 年 5 月第二版 200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058-5453-4/F·4713 定价：49.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修订版)

编撰委员会

顾 问 金普森 孔永松 陈宝森 叶振鹏

主 编 许 毅

副主编 第一卷：王晓光 申学锋 张 侃
第二卷：王晓光 申学锋 张 侃
第三卷：潘国旗 张 侃 申学锋
第四卷：潘国旗 张 侃 申学锋

总 纂 许 毅 申学锋 张 侃 柳 文

编 委 许 毅 隆武华 王国华 欧阳宗书
张 侃 赵云旗 王晓光 潘国旗
申学锋 柳 文 易继苍 陶水木
黄宝忠

究源发新 服务现实



——《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开头语

金
普
森

时光是不能往后看的，仿佛并非很久，其实已经很久。近代中国外债资料的整理与近代中国外债史的研究，在扬州开会商讨近代外债史的研究，似是昨日之事，但已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光。学术研究是花费时间与精力的事，发掘与搜集资料是无穷尽的，学术研究更无止境。只有在占有厚实史料的前提下进行潜心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文稿才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不断学习研究，不断思索推敲，修正自己撰写的文稿，才能与时俱进，使学术生命长青。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在许毅教授带领和指导下，我们对中国外债史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搜集、整理，先后完成了《清代外债史资料》、《民国外债档案史料》、《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等资料整理工作。为了统一思路，许毅教授于1988年发表了《论“两声炮响”与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关系》一文，提出了外债



的两重性问题，强调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论述外债在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形成方面的意义。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和长时期的思考，他开始酝酿以外债为切入点，通过对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举借外债、利用外资情况的考察，来剖析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方方面面，达到寻求规律、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而为我们当前乃至今后的各项建设工作提供借鉴的目的。这就是许毅教授主编的四卷本丛书《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的由来。究源发新、服务现实是研究中国外债问题的宗旨，也是这套丛书的出发点与立足点。丛书出版后，许毅教授要求作者对四本书进行认真研读，详尽考订，仔细修正，将修订后的书稿再次出版。在丛书修订版付梓之际，我把读许毅教授著《中国特色论》感受而写下的一文，稍作修改，权充这套丛书修订版的开头语。

究源发新，治史者的追求

对历史的不断探究是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不断地发新则是治史者的责任。历史研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付出艰辛的创造性劳动，才能究源发新，使我们的认识走近历史。

在对近代中国外债的研究中，许毅教授揭示了“富有四海”的清王朝为什么会走上举借外债、甚至依赖外债以度日的根源。从1661年到1796年是史称的“康乾盛世”，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盛世以后，为什么清王朝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呢？这种巨大的反差要求我们必须研究从“康乾盛世”到“嘉道中落”直至“宣统覆亡”的历史原因。早在1988年，许毅教授在《论“两声炮响”与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关系》一文中就提出了上述问题。经过几年的研究，他于1996年与王国华一起撰写了《由康乾盛世到嘉道中落的教训》一文。文章考察了盛世的起源与盛世气象，探究了盛世危局和衰落根源——奢侈与腐败，剖析了嘉道中落的催化剂——使中国元气大伤的鸦片贸易，阐述了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是鸦片战争的致命打击。从而得出结论：“鼎盛之际，统治阶级居功自傲，放弃了文治武功、励精图治的积极进取精神。乾隆羡慕江南湖光山色，六次南巡，沿途的接驾盛况，奢靡之极，上行下效，腐败之风刮得剽悍无敌、英勇善战的八旗子弟和绿营，变成战则必败、祸害百姓的罪魁；清正廉洁的满汉官员，变成官无不贪、吏无不恶的祸首。文治武功全废。在英国殖民主义于1840年发动的鸦片战争中，虽然在汉人将领抗



拒之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焚毁了没收的鸦片，清政府却摘了林则徐的帅印，以致转胜为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为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开了先河。”^①

通过对“康乾盛世”的形成和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考察，使人们对“历史周期率”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这里，给我们说明了一个真理：经济的发展，文明的昌盛，如果是自发的发端而不觉，如果不为人民而只图一时之享受，如果不提倡为公而只倡导为私，其能留给自己的只能是苦涩。人们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往往因无知、侥幸、自私而贻误大业，为自己留下的只是毁灭的祸根。对此，《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第一卷得出结论：清朝由盛转衰的历史事实证明，腐败是万恶之源。清朝的衰败灭亡与腐败有关，外债也与腐败有关。腐败断送了清王朝，腐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陷入被瓜分的深渊。腐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在兴盛和富裕后不思进取，贪图享乐，骄奢懈怠，必然会腐化衰败，挨打受气，任人宰割，最后灭亡。盛而骄，骄而奢，奢而贪，贪而腐，腐而朽，朽而亡，这就是清王朝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这个教训是值得认真吸取的。

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是20世纪中国先进分子思考与求索的问题，也是《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论述的一个重大问题。许毅教授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遵循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②这一原理，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是借助于洋务运动、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建立的近代化大生产的生产力，从而提出了中国近代化大生产的生产力是怎样发展起来的问题。究源才能发新，才能深层次地回答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重大而根本的问题。

许毅教授在《论“两声炮响”与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关系》和《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的特殊性》两文中，详细阐述了我国现代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他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创造过程，不是从自身的生产方式中一步一步游离出来的，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之后，为了反压迫、反侵略，为了自强，不得不引进外国资金与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用举借外债的特殊方式，发展近代工矿企业、铁路、邮电、航运、通讯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所有这些方式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

① 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106页。



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① 凭借国家信用向外国举债，直接买进先进技术，发展生产力，这是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特殊形式。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另一种形式，是国家政权利用国家财政，直接动用国库或国家信用（包括内债），来创办工业。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三种形式是大官僚（包括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以及后来的宋子文、孔祥熙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或侵占公款，创办近代工矿企业、金融事业。举借外债则是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方面。许毅教授还特别提到决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方式的演变过程。他认为：“我国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与‘两声炮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② 以往的历史学界、经济学界对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中，多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对中国的影响来分析，忽视了对十月革命炮声之所以在中国产生影响的物质基础的考察。没有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阶级基础，中国不可能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要了解十月革命期间中国的物质基础，必须究源于鸦片战争的炮声给近代中国的影响。正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打开了清政府的国门，“清政府为抵御外国侵略，发展军用、民需工业、交通运输业、邮电事业，便举借外债，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展了社会化的生产力”^③。

近20多年中，许毅教授带领我们就外债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分析，粗略统计在新中国诞生前的96年（从1853年上海洋商借款算起），举借外债共计900多项，目前查明的约有730多项。清政府时期举借的155项外债，用于发展经济的占借款总额的29.2%；南京临时政府举借的23项外债，用于发展经济的占借款总额的25.84%；北洋政府时期举借的387项外债，用于发展经济的占借款总额的40%；护法军政府举借的57项外债，用于发展经济的占借款总额的47.8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举借的36项外债，用于发展经济的占借款总额的31.11%。

从以上几个历史时期来看，中国近代外债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也是它们在华争夺政治、经济权益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外债所产生的历史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外债为道德上的恶所形成，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④。“中国近代化的生产力、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可以说主要是依靠外债。”^⑤

① 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页。

② 许毅：《中国特色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③ 同上书，第4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

⑤ 许毅：《中国特色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服务现实，学术研究的宗旨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出于时代的需要，人们总会不断地从历史中寻求启示，并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然而，历史不应是任人摆弄的玩偶和映射工具，它应有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治史者立足现实，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把促进社会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的字里行间，处处闪耀着一位老革命、老学者“研究历史、服务现实”的良知与责任。

在中国财政史的研究中，许毅教授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不应就财政论财政，就外债论外债。他曾在《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和研究财经史的方法》一文中写道：“财政史是财政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本身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然而，在财政史的教学与研究中，就财政论财政的倾向相当严重，致使一部财政史变成了一部就财政制度论财政制度、就财政思想论财政思想，脱离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演变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制度罗列、思想罗列。它既不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又找不到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造成目前财政史的教学与研究缺乏生气的直接原因。”^① 如何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既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统一的“普遍规律”运用到财政学特别是财政史的研究中去？他说：“这是当代财政理论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为从事财政理论研究与财经工作的一员老兵，我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和思考。我认为，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一‘普遍的规律’，无论是改革还是总结历史规律，都必须以邓小平同志教导的革命和改革都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出发点和归宿。”^② 他充分地理解恩格斯在撰文介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关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辩证法思想，并运用这一方法，从生产力再生产规律、生产关系再生产及生产方式再生产规律、社会关系再生产规律三个层面，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进行了剖析。通过这种剖析，使财政史的研究范围得到拓展，打开了沉闷的窒息空气，同生动的市场经济联系起来，成为研究经济运动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能指导实践的学科，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挥了应有的史学资治功能。

① 许毅：《中国特色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0～91 页。

② 同上书，第 91～92 页。



在外债史研究中，许毅教授对外债的两重性分析，也是着眼于国家的独立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外债的每一个毛孔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外债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上控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一部近代中国外债史，就是一部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上控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一部近代中国外债史，就是一部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上控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外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更多的资本、更多的技术、更高的生产力和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发展的要素。许毅教授反复强调要认真研究外债的两重性，“在利用外债过程中扬长避短”；对外债“利用得好，会给一国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进和加速作用，利用得不好则会给社会和人民造成沉重负担，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健康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引进外债的过程中必须加以科学论证，谨慎对待”^①。他提出，要吸取20世纪80年代世界性债务危机和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他还时刻关注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他所做的研究，都是为吸取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为如何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现实问题在某些方面做出自己的解答。

在许毅教授的主持下，从1983年开始，我们对近代外债资料进行整理，编辑出版了《清代外债史资料》、《民国外债档案史料》和《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等，约千万字以上。随后，对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的外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撰写了这套四卷本的《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当第四卷书稿完成后，许毅教授提出要写一篇总结性、概括四卷内容的结束语。经过多次讨论，命题为《科学的实践 历史的启迪——〈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结束语》，强调本丛书写作的目的绝不在于简单地记录历史的变迁，而是通过回顾清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社会主义新中国时期这四个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成败得失，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而为我们当前乃至今后的各项建设工作提供参考，以便早日完成中共中央制定的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外债虽是这套丛书的主线，但也仅仅是切入点。认识今天，展望未来，首先要以认识昨天为基础；认识昨天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今天、展望未来。正如列宁谈到历史研究时所说的：“为了用科学的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②在丛书的结尾部分，从中国近现代的史实出发，并从客观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实践中理出了16个问题，阐述了基本理论，总结了经验。这16个问题对我国当前的建设以及未来长远的发展，会起到积极的宏观导向作用。

① 许毅：《中国特色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许毅教授从干部到学者，研究历史源于现实的困惑，走了从现实追溯历史，又从历史回到现实的治学道路。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给了他不一样的眼光和见识，他也给了我们挣脱学术之茧的利刃。

与时俱进，学术生命长青

《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着眼于对历史的考察，但其根本目的不是单纯地描述历史进程，而是通过对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让大家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及其社会性质。为了从更高的理论层次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问题，许毅教授于2004年出版了专著——《中国特色论》。这部著作与《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可谓相辅相成：一个侧重理论的把握和现实问题的解决，一个注重历史资料的搜集与历史借鉴。所以我在这里有必要谈谈《中国特色论》一书。

《中国特色论》不仅反映了许毅教授历史的大眼光，也反映了他与时俱进的人生追求。他在前言中写道：“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不能变，但是它的具体应用要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规律，两者的相互适合也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一定条件下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慢慢又会不适应于生产力的新发展，两者总是在动态的发展中获得平衡。在学术研究领域，这种动态的发展过程同样是客观存在的。人的认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事物的不断涌现而逐渐向前发展的，具体到这本书中收入的文章而言，它们既是紧紧围绕着中国特色论这个中心议题而展开，同时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在学术研究领域不断深入实际、与时俱进的客观反映。”^①

与时俱进使许毅教授的学术之树长青。1976年，他牵头组织北京及浙、闽、赣的专家学者，深入到中央苏区，发掘整理中国共产党在闽、浙、赣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时期的财政经济史料，编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版）。而后又组织了全国从事中共党史、财经史的部分学者，对陕甘宁边区、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川陕、湘鄂西、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东、东北、中原以及东江、琼崖等中国革命不同历史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史料的收集

^① 许毅：《中国特色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在各地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下，选编了31种、约4000多万字的财政经济史料。对其中一些较大的根据地，还编写出版了根据地财经史，共18种，约560万字。在这些成果中，一方面回答了如何依靠落后的农村经济来支持革命的需要，进而由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另一方面也解答了如何解决落后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反作用原理。

大家都知道许毅教授是我国财政理论界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的倡导者之一。他扬弃了西方资本主义“公共消费”、“公共财政”等理论的影响，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逐步形成了有关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国家分配论”搞清楚了财政分配的对象是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分配关系与分配形式和分配活动的主客观关系，揭示了财政分配方式在不同生产条件下具有特殊的运行方式。改革开放后，财政分配作用有了变化，预算在社会分配中比重下降，客观上要求重新认识财政调控国民经济的直接形式和间接形式。然而一些人以为我国现在搞市场经济了，主张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消费论”、“公共产品论”改头换面地引入到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中来。许毅教授在《中国特色论》一书中，写了10篇文章，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论”。他在《财政学基础理论的理论基础》一文中，对研究财政理论提出四个必须，即：必须明确财政学的地位，必须研究国内外的政治经济问题，必须明确国家职能与财政职能的关系，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理论与西方财政理论的区别。在对上述问题分析的基础上，他进一步阐述了“国家分配论”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内容十分广泛，概括其主要观点为四论，即：主体论（财政分配的主体是国家）、制导论（分配的目的在于制导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结构论（通过制导论，使生产力结构、生产关系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组织结构等建立在先进的科学基础之上）、机制论（研究利益关系，确定最佳的利益分配格局）。文章在最后提出：“为了适应时代对财政理论与财政政策提出的要求，在当前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通过对国家分配论的进一步完善，使我国的社会主义财政学体系更符合新时代的要求。要从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出发，在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学说和政治经济学说，创造性地发展财政学理论与国家宏观调控理论。要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发展观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思考，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论，又反对不加分析地使用拿来主义的洋教条以及狭隘小生产思维的经验主义。我们进行财政学研究，就是希望要在发展国家分配论的过程中，广大财政工作者能更好地掌握研究问题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领会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科学的国家学说，使我国的财政学真正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学的一部分，以

更好地指导我国的财政工作。”^① 在《建立广义财政学的倡议》一文中，许毅教授又写道：“建立广义财政学要从分配方式与生产方式、财政政策与经济运行、国家职能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出发，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财经工作的实践经验，借鉴各国经济学科的优秀成果，以生产力结构优化为核心，以要素分配与利益分配的协调为基点，完善与发展‘国家分配论’的财政理论体系，重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体系和分配方式。”^②



少长咸集，集体智慧的结晶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张劲夫和齐燕铭同志的指导下，由许毅教授牵头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及闽、浙、赣三省的一些专家学者，深入到中央苏区，发掘整理中国共产党在闽浙赣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时期的财政经济史料。在取得经验之后，又组织全国的历史学、经济学、财政学界的专家学者对红军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这支研究队伍十分庞大，可用王羲之《兰亭序》中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来形容。专家学者耗时十余年，取得了丰硕成果，对此本文第三节已有说明，不再赘述。

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同志要许毅教授主持晚清以来的外债、外资史料的整理和外债问题研究。为了完成这一重大课题，许毅教授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在中国历史档案馆、清史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等单位的协助下，开始了外债档案史料的整理工作。这项资料整理工作十分艰巨，债项史料有历届中央政府举借的外债，地方政府或企业部门经中央政府授权、批准、承认、担保订借的外债，还有赔款转化而来的外债。这些史料分布在外交部、工商部、铁道部等部门的卷宗内，其内容包括有关债项的照会、说帖、合同、呈文、议案、训令、章程、规则、函件、电文、记录、报表等等。在文字上，除中文版本之外，还有英文、俄文、日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等。参加外债档案史料整理的除专家学者外，还聘请了几位国民政府时期任职于外国银行、外资企业的高级职员。历时十年有余，完成了《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的整理与出版。当时除中青年学者外，还有几位是80岁以上高龄的专家。沙老（镜衡）、汤老（撝兰）未及该书正式出版，就谢世了。

在整理外债档案史料的同时，许毅教授组织了几位从事财政经济史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对近代中国外债进行系统、深入、全方位的研究。外债问题研究，在许毅教授领导下，有颜泽夔教授、孔永松教授、赵云旗研究员、隆武华博士、王国华博士、王晓光副研究员和我等组成。而后，隆武华博士、赵云旗研究员另有高就，又有潘国旗博士、欧阳宗书博士、张侃博士、申学锋博士、柳文博士加入。这是一支少长咸集的队伍，特别是后来加入的一批博士们，精通外语，计算机操作熟练，知识面广，接受新知识很快，在许毅教



授的指导下，在外债问题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正因为有新生力量的加入，《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的研究与撰写才得以如期完成。这套丛书倾注了作者 20 余年的心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此特别要提到的是颜泽夔教授和罗立人（原名庄志逵）女士。颜泽夔教授是著名的会计师，他为近代中国外债史资料的整理奔波于北京、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协助许毅教授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丛书第一、二、三卷书末的附表——外债一览表，均由他提供。遗憾的是颜老因年事已高，于 2002 年逝世，未能看到《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丛书四卷本的正式出版。罗立人大姐（从 1977 年在江西瑞金认识她的那天起，我一直称呼罗大姐）是许毅教授的夫人，他们在 1938 年苏北敌占区救亡工作团时一起并肩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许毅是“苏北敌占区救亡工作团”的联络部长。为解决经费及公开身份的问题，在他的家乡南通县（现南通市）姜灶镇开了两个商店——“新民商店”和“甦声商店”（也是城里与城外联系的秘密交通站）。“甦声商店”是专门做动员、组织女青年工作的，罗立人就是这个商店的负责人。许毅和罗立人从相识、相知、相爱到结为夫妻，他们相亲相爱，荣辱与共。许毅教授从事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研究到主持中国外债史料的整理和外债问题的研究，罗大姐一直陪伴左右，支持其工作，对他带领下的这支研究人员也是关怀有加。近 30 年内，我除本职的教学工作外，一直在许毅教授的指导下从事近代中国外债和新中国外债的研究，并写下了多篇文章。罗大姐一直鼓励我，并录下了李大钊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书赠与我共勉。罗大姐书写的条幅我珍藏着，也勉励着我从事学术研究。遗憾的是，病魔夺走了罗大姐的生命，她未能看到近代中国外债和新中国外债研究成果的完整出版。在开头语中写下了这段结束语中应讲的文字，是为了表达我内心对她的敬意与纪念。罗大姐书写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愿全体从事外债问题研究的同仁共勉。

2006 年春于杭州颐景园寓所

导 论



82

1

一、研究本课题的缘由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召开了理论务虚会。会议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重要命题，提出要研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规律性问题，认识中国国情，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那时，许涤新同志正在从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齐燕铭同志从事革命根据地财经理史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内容和我多年思考的一些问题密切相关。国务委员、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同志和财政部副部长李朋同志要我研究财经理史。在张劲夫、齐燕铭同志的指导下，由我牵头，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